

后现代视域下的社会风险防范

——兼与肖瑛和张乐、童星教授商榷

□ 陈新光¹ 鲍宗豪²

内容摘要 在全球化日益深化，推动现代社会向后现代社会转型的今天，人类面临各种社会风险的严峻挑战。贝克和吉登斯的社会风险理论解释不了当今中国面临的社会风险问题，以“资本”为灵魂的资本主义更无法解决世界社会风险问题。以“后现代”为研究视域，以结构性风险、阶层性风险和价值观多元化风险为三维视角，有助于深入探索后现代中国社会风险的特征、成因及其防范，加强后现代中国的社会管理，并推进中国特色社会风险理论的构建。

关键词 后现代 社会风险 三维视角 防范 社会管理

作者 1 陈新光，华东理工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生；2 鲍宗豪，华东理工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200237）

《探索与争鸣》2012年第4期刊登了肖瑛和张乐、童星教授关于社会风险的两篇论文。^{〔1〕}肖瑛认为，中国的风险社会既是世界风险社会的一部分，又具有独特的生成与运行逻辑，面对这一独特的风险社会，需要选择独特的研究视角以及研究路径，提出了在方法论上如何将西方社会风险理论和概念本土化的课题。张乐、童星两位教授则由日本2011年3月11日发生9级特大地震引发海啸与福岛核电站核泄漏的事件出发，从风险管理的角度提出了2012年危机来临之时，管理机构应该怎样运用沟通原则实现善治型的风治理目标。笔者认为，两篇文章对风险理论的探索很有启发，但都是从西方风险社会理论的角度来谈中国风险社会的管理和防范，这远远不够，本文试图以“后现代”为视域深化对中国社会风险的研究。

后现代：研究社会风险的视域

社会风险是一种导致社会冲突，危及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的可能性，更直接地说，社会风险意味着爆发社会危机的可能性。如果将20世纪全球冷战结束人类进入21世纪，看作是现代向后现代的转变，那么，21世纪的前十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人类社会开始整体跨入了后现代化的门槛。在现代化向后现代转变过程中，人们普遍在从核危机到恐怖主义、从环境恶化到生态危机、从金融风暴到经济危机、从传染病肆虐到食品安全隐患、从社会信任危机到精神心理焦虑等社会风险中感受到了严峻挑

战。到了后现代社会，风险的发生更频繁、类型更复杂（各种风险交织）、更尖锐，以致可能引发局部冲突、局部危机。因此亟待构建破解后现代社会风险的中国特色的社会风险理论。

（一）西方思想家社会风险理论的价值

风险问题在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开始，引起西方社会的高度关注，在这研究过程中“风险”概念逐渐成为社会理论的一个关键范畴和现代社会理论的核心议题。五六十年代西方对风险问题的研究主要有奈特的风险理论、卢曼的社会风险理论、罗马俱乐部的生存危机论、里夫金和霍华德的熵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异化理论和后现代主义的现代性危机论，其中有影响的理论有罗马俱乐部的生存危机论和后现代主义的现代性危机论。

后现代主义的现代性危机论，是韦伯在发现现代性的内在悖论——理性化的过程导致非理性的存在方式进行思考过程中提出的。现代主义认为进步主义关于社会是无限向前发展的这种观念过于乐观，现代性的各种危机表明，理性主义主导的现代化理想模式，并没有在现代化进程中兑现，反而制造出新的矛盾、混乱和不确定因素，因为理性内在地包含着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其运作的后果会导致新的矛盾和风险。

贝克和吉登斯在揭示现代性的悖论之后，都力图开出药方，希望通过对现代性的反思，破解现代性的悖论，化解社会风险。贝克指出“风险是个指明自然终结和传统终结的概念”^{〔2〕}，把“风险”作为一个社会理论的基本范

畴来看待。吉登斯不仅从词源的角度对风险概念作了考证和分析,指出风险概念的内涵“与可能性和不确定性概念是分不开的”,同时,进一步区分了“外部风险”和“人造风险”的标准,并强调“风险与危险并不是一回事。风险涉及到那些我们主动寻求与之面对以及对其进行估量的危险”^[3]。简言之,风险是对我们将面临的危险的一种预判和预测。

(二) 对贝克与吉登斯风险社会理论的反思

贝克和吉登斯风险社会理论的价值有三:一是揭示了现代社会风险的独特性,即从社会风险的来源及其表现分析,本地风险主要是人为性风险;从全球化的视角分析,现代风险主要是全球性风险;从现代性的视角分析,社会风险是现代性异化的结果;从现代社会的关联度分析,社会风险已变成现代社会的结构性特征。二是风险社会的逻辑形成,贝克和吉登斯都把风险社会视作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它所对应的是“自反性现代化”,现代性的四个维度——工业主义、资本主义、监控系统和军事力量,可能引发四种严重的社会风险——对世界生态体系的冲击、大规模的贫困、大规模破坏性武器的存在、对民主权利的大规模压制。三是风险社会理论的结构困境。贝克和吉登斯的社会风险理论探讨了风险社会的结构特征,以及社会风险控制的结构困境——主要是风险社会的结构性断裂和结构性风险与社会风险控制的结构性依赖。

贝克和吉登斯为化解风险社会的风险所开出的药方,实质上都是要回到韦伯所提出的“目的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整合上。然而,中国的“风险社会”并非完全贝克意义上的“风险社会”——尽管两者之间有着非常多的一致和重叠。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欧债危机、全球性危机,2011年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行动、英国的学生骚乱而引发的暴乱、英国“占领伦敦证券所”行动等,并没有因为贝克和吉登斯的预判、重新启蒙而避免。对后现代社会风险的化解,需要的是公平公正的制度安排、公平公正的秩序维护。

后现代中国社会风险的三维视角

笔者提出后现代研究中国社会风险的三维视角,作为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风险理论的一种探索。

(一) 立足后现代研究中国社会风险

之所以强调是“后现代”对社会风险的研究,因为后现代全球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社会风险的发生日益广泛、日益频繁、日益尖锐,后果越来越严重。后现代社会是相对于前现代、现代社会而言的。21世纪前十年的社会现代化,出现了三个明显特征:一是社会现代化将现代化的重心由经济、技术、知识转向社会发展。二是社会现代化是一场非常深刻的重构当代都市人生活方式的革命,伴随着

“后全球化”的到来,以获取物质财富为主要动机的“生产本位论”正为“生命本位论”、“生活本位论”所取代,全球都市公民更关注、重视生命、生存和生活的质量。三是后现代的社会现代化,本质上标志着全社会公民对社会生活质量、社会福利、社会公平的期望提高。

后现代社会风险的主要原因,是以“资本”为灵魂的资本主义无法解决社会大多数人的生存与发展问题。如果说,英美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在其工业现代化进程中,宗教伦理还对资本的贪婪有规范、约束作用,那么随着美国华尔街金融产品的不断创新,金融市场上演的一幕幕“圈钱”闹剧,“金融资本”对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剥削表现得更贪婪、更巧妙、更不受约束。这也彻底暴露了以“资本”为灵魂的资本主义和盎格鲁—撒克逊模式,遇到了难以跨越的以“社会”为核心(即要解决大多数人的富裕问题)的现代化之“坎”。

(二) 后现代中国社会风险的三维特征

“后现代”中国的社会现代化,既要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又要实现社会全面小康、和谐社会构建的目标;既要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西方发达国家在较长时间所经历的社会现代化,又要在同一过程中消除西方国家社会现代化过程中所经历的“现代化痛楚”、“发展性危机”、“社会风险”。西方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的历时性矛盾,在当代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成为共时性矛盾。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社会矛盾交织在一起,融为一体,使当今中国的社会现代化发展呈现出错综复杂的状态。

1. 结构性风险

目前中国社会面临的诸多风险,其核心是社会结构性风险。学界通常理解是由于社会结构变化太快,产生的种种不确定性而带给人们行为的不确定性,进而产生风险。后现代中国结构性风险主要表现为:一是贫富分化、贫富差距的结构化;二是社会保障相对滞后,从而影响社会的稳定;三是权力腐败不仅造成国家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且严重影响社会稳定。

2. 阶层性风险

阶层性风险是指由于不公正、不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引发社会不稳定的可能性。后现代中国社会的阶层性风险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社会主要群体弱势化。这些群体包括农业劳动者、产业工人、城乡无业失业和半失业者等。社会主要群体弱势化意味着三大严重后果:削弱党和政府执政的社会基础,增加政治风险;大多数社会成员不能共享社会发展成果;削弱经济发展的拉动力。二是社会精英结盟。目前,中国社会精英群体主要包括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三大群体。精英群体结盟的另一严重后果,就是导致垄断利益和以权谋私利益的出现,并形成对社会资源和机会的垄断,会直接损害为数众多的弱势群体利益,容易产生“相对剥夺感”,引发广泛的公愤,

造成社会动荡。三是中间阶层发育缓慢。在社会冲突理论中,中间阶层是最稳定的社会力量,是社会的缓冲带。中间阶层发育缓慢,会成为后现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面临的又一重要风险。

3. 价值观多元化风险

文化交流与文化融合既是精神心理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社会稳定的重要机制。一个处于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交织,现代向后现代转型过程中的中国社会,常常会因价值观念的多元化而导致文化冲突乃至社会风险。主要表现有三:一是社会基本规范失效。社会基本规范的失效是因为文化多元化导致社会价值观、文化价值观的混乱而造成心理、心态的扭曲,社会基本规范的失效。二是社会信任危机。社会信任包括组织信任和个人信任,相比较而言,组织信任对社会影响更大,其实质是对社会秩序的信任。目前,信任危机集中表现为政府信用危机和企业诚信危机。三是社会隔阂加深。随着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逐步形成和固化,社会各阶层的隔阂也在不断加深,这种隔阂和固化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社会认同感低和阶层之间的对立。社会日益被肢解为多个具有不同时代特征的生活空间,特别是泾渭分明的“贫富分居”容易造成穷人对富人的仇视和富人对穷人的歧视,放大阶层之间的不平等状态。此外,在中国还有一个特殊的现象,就是农民工群体长期被拒于城市主流社会之外,这极大地加深了社会的隔阂。

加强后现代中国社会的治理,防范社会风险

西方的风险研究中成果最多的领域是风险管理和治理,而这个主题在中国国内风险研究中恰恰是最为薄弱的领域^[4],如贵州瓮安群体性事件、广东乌坎村群体性事件和温州高铁事故所衍生的各种后续性风险,都反映了地方政府和社会风险治理能力滞后的问题。进入后现代社会,由人类自己制造的社会风险防范不胜防,我们要充分认识“后现代”社会风险发生的必要性、广泛性、多样性和尖锐性,更要通过加强社会管理,协调各种利益关系,化解社会风险,以重建社会公平的现实,促进社会文明和谐发展。

(一) 社会管理的根本目的是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

我们认为在后现代中国国情下,社会管理的基本任务包括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正、应对社会风险、保持社会稳定,创造既有活力又有序的经济社会发展环境。加强社会管理首先需要有一个“软环境”,即一个凝聚社会共识的核心价值观体系。社会共识的内容表现在理想信念、伦理规范、价值评价、情感体验、理论观点等方面。转型社会的

有序、和谐发展,一靠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适应,二靠政治设施和法律制度的强力,三靠社会各阶级在思想意识达成的妥协,即社会共识。正是基于此,中国封建社会历代明君贤臣都把民心看作稳定天下的第一要义,欧洲近代许多思想家也都一再强调“社会契约”、“公意”等理论观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加强社会管理的根本宗旨在于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凝聚社会共识,不断完善转型社会的秩序构建。

(二) 不断完善社会规则、社会规范是加强社会管理的必然要求

个体化是风险社会的一个重要维度,在工业社会,个体化经过三个阶段:一是“脱域”或者“解放”,即个人从传统支配模式中脱离出来;二是“传统安全”的丧失或者是“稳定性的丧失”,即在实践知识、信任以及指导性规范等方面丧失安全感;三是“再嵌入”或者是“再整合”,即一种新的社会承诺的生产,也就是个体化的制度存在。个体一旦失去传统工业社会的认同基础和保护屏障,就进入了风险社会。

进入后现代社会,对转型社会秩序的构建是一个历史过程,要超越风险社会的“亚政治”和“生态政治”,这就要求“社会秩序”的理念是一种制度与规则,尤其当其内化为公民的一种心理素质与行为方式时。当前,我国正在由经济增长驱动型的发展模式转向经济社会协调并重的发展模式,并将最终转向社会或者说社会现代化驱动型的发展模式。为了适应这一转型和社会管理创新,既不可能恢复改革开放以前那种政府对社会实行大而全的全面行政掌控,由“国家包办社会”的方式,也不应该继续放大这20多年来某些重要社会领域由市场左右,在GDP主义支配下,“把社会管理扔给市场”的方式。政府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从总的趋势上应该要建立以社会规则、社会规范为特征的社会管理,通过意识形态的社会化、法律法规、政府政策、社会规范行动、资金以及税收与福利分配等手段和途径,监管和规范各种社会制度、社会规则、社会组织与规章、风俗习惯等,调节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实现社会的有序与和谐。

(三) 加强媒体沟通,是加强社会管理的重要举措

正如5·12汶川地震发生后,中国各大媒体采取了高强度、长时间、不间断的跟踪报道和直播,这有利于人们了解地震造成的严重后果,许多各种小道消息和谣言不攻自破,及时化解了可能产生的社会风险,在国际上也产生了很好的影响。从社会管理的角度来看,必须加强与媒体的沟通,及时掌握信息的发布与传播的尺度,使政府的风险信息发布与风险预警专家系统的风险解释之间保持相对统一的口径。这里需要强调的是,风险信息的发布与反馈应该通过正规、权威的渠道进行,而权威媒体机构在多大程度上公开可以公布的细节,则是对其政府管理能力的重

大考验。

（四）建立健全社会风险评估机制是加强社会管理的重要手段

针对当前应对突发事件中存在的问题，要建立社会风险评估机制，促进社会管理的创新。建立社会风险评估机制，实际上是要从源头上构建社会管理的机制。在管理环节上，要从偏重事后处理向更加重视源头治理转变，把工作重心从治标转向治本；在管理制度上，要坚持加强源头治理体系建设、强化动态协调机制建设、推进应急管理机制建设，构建相互联系、相互支持的规范、机制和制度体系。把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作为出台和实施重大决策、重大项目、重大改革的前置条件，围绕合法性、合理性、可行性和安全性，认真开展评估工作，及时提出风险化解对

策，并从法律法规和政策方面提供配套支持。

参考文献：

- [1][4] 肖瑛.风险社会与中国.探索与争鸣, 2012 (4) ; 张乐、童星.风险沟通：风险治理的关键环节.探索与争鸣, 2012 (4) .
- [2] 乌尔里希·贝克、威尔姆斯，路国林译.自由与资本主义：与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对话.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119.
- [3] 安东尼·吉登斯，郑戈译.第三条道路——社会主义的复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67.

编辑 阮子瑗